



古代城市

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

[法] 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著

吴晓群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古代城市

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

[法] 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著
吴晓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 / (法)
古朗士著；吴晓群译。—2 版。—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1

书名原文：The Ancient City
ISBN 978-7-208-10491-4

I. ①古… II. ①古… ②吴… III. ①城市史—研究
—古希腊 ②城市史—研究—古罗马 IV. ①K125 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0184 号

责任编辑 方 已 马晓玲
封面设计 黄安乔



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
[法] 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著
吴晓群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 页 2
字 数 331,000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491-4/K · 1854
定 价 42.00 元

中文版译自

The Ancient City

by Fustel de Coulanges

Originally in French

the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Willard Small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ew Edition 198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中译者前言 / 1

英文版前言 / 17

导言：为了解古代制度有研究古人早期信仰的必要 / 33

卷一 古代信仰

第一章 有关灵魂与死亡的观念 / 39

第二章 死者崇拜 / 45

第三章 圣火 / 50

第四章 家内宗教 / 59

卷二 家庭

第一章 宗教是构成古代家庭的原则 / 67

第二章 婚姻 / 70

第三章 家庭的延续，禁止独身，不育情况下的离婚，儿女间的不平等 / 76

第四章 过继与出继 / 81

第五章 亲属关系，罗马人所谓的“宗族关系” / 84

第六章 所有权 / 89

第七章 继承权 / 100

 一、古代继承权的性质与原则 / 100

 二、儿子有继承权而女儿没有 / 102

 三、同辈继承 / 105

 四、出继与过继的结果 / 107

古 城 市

五、 最初无遗嘱制度 / 108

六、 长子继承权 / 110

第八章 家庭中的权威 / 113

一、 古代父权的原则与性质 / 113

二、 列举父权之种种 / 117

第九章 古代家庭的道德观 / 122

第十章 希腊罗马的氏族 / 128

一、 古代作家所说的氏族 / 129

二、 对罗马氏族几种解释的考察 / 132

三、 氏族就是仍保持其最初的组织及团结的家庭 / 135

四、 最初，家庭(氏族)是惟一的社会形式 / 138

卷三 城市

第一章 胞族、库里亚与部落 / 145

第二章 新的宗教信仰 /

一、 自然界中的诸神 / 149

二、 此种宗教与人类社会演进的关系 / 150

第三章 城市的建立 / 155

第四章 城市 / 162

第五章 对建城者的崇拜，埃涅阿斯的传说 / 170

第六章 城市的诸神 / 176

第七章 城市的宗教 /

一、 公共会餐 / 185

二、 节庆与历法 / 188

三、 户籍调查 / 190

四、 集会、元老院、法庭、军队及凯旋礼中的宗教 / 192

目 录

第八章 仪式与编年 / 196

第九章 城市政府，国王 / 202

 一、国王的宗教权力 / 202

 二、国王的政治权力 / 205

第十章 官员 / 209

第十一章 法律 / 215

第十二章 公民与外邦人 / 222

第十三章 爱国主义与放逐 / 226

第十四章 城市精神 / 229

第十五章 城市间的关系，战争与和平，诸神的联盟 / 233

第十六章 罗马人，雅典人 / 238

第十七章 国家至上，古代没有个人自由 / 247

卷四 革命

第一章 贵族与门客 / 253

第二章 平民 / 258

第三章 第一次革命 / 263

 一、剥夺国王的政治权力 / 263

 二、斯巴达革命史 / 265

 三、雅典的同类革命 / 267

 四、罗马的同类革命 / 270

第四章 贵族统治城市 / 274

第五章 第二次革命，家庭结构的变化，长子继承权的消失，氏族的分裂 / 278

第六章 门客获得自由 / 282

 一、最初门客的状况及其变化 / 282

古 代 城 市

二、雅典门客制度的消失，梭伦的功绩 / 287
三、罗马门客制度的变化 / 290
第七章 第三次革命，平民进入城市 / 294
一、有关这次革命的一般情况 / 294
二、雅典革命史 / 301
三、罗马革命史 / 306
第八章 私法改革，十二铜表法，梭伦法典 / 325
第九章 政府组织的新原则，公共利益与投票权 / 334
第十章 建立一个富有的贵族阶层的企图，民主制的建立，第四次革命 / 338
第十一章 民主政府的法则，雅典民主政治的实例 / 344
第十二章 富人与穷人，民主制的衰落，平民暴君 / 351
第十三章 斯巴达革命 / 357

卷五 城市制度的消失

第一章 新的信仰，哲学改变政治原则 / 367
第二章 罗马的征服 / 375
一、罗马的起源与居民 / 375
二、罗马的第一次扩张(公元前 753—前 350 年) / 378
三、罗马是如何成为帝国的(公元前 350—前 140 年) / 381
四、罗马到处摧毁城市制度 / 388
五、被征服的民族陆续进入罗马城 / 392
第三章 基督教改变政府形态 / 400
主要译名对照表 / 407
2012 年再版后记 / 415

中译者前言

—

1864 年，法国历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发表了《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一书，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各种信念（即宗教信仰）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创建者。该书一出版立即获得了成功，之后不断地再版、重印，到 1924 年时已重印了 28 次之多。外文版本也接连问世，1867 年出版俄文本，1873 年出版第一个英文本，1876 年西班牙文本出版，1907 年第一个德文本出版，1924 年意大利文本出版。时至该书问世 120 周年后，在法、德、英语学术界又都推出了新版。本书的中译本民国时期就已面世。^[1]

该书问世时，古朗士尚是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教授。他以自己 1862 年至 1863 年间的一套讲义为依据，仅用六个月的时间就写

[1] 译者为著名史家李玄伯，他将此书书名译作《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成了《古代城市》一书。《古代城市》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关注，很快在法国就成了一本理所当然的参考著作，当时所有的评论都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即作者文风精审明朗，严肃而不刻板，很能吸引并说服人。^[2]该书还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起被视作“是19世纪所产生的最新颖与写得最出色的历史著作”。^[3]而且，“就其写作手法、内容布局或是文章风格等方面说，都是一部杰作，后来就成了法国历史著作的典范”。^[4]1984年法文新版的前言中称，“《古代城市》改变了至少是法国的学术界，提出了真实的问题，创造了新的思想主题，单凭这些，就足以载入史册”。^[5]时至今日，后世学术已有很多增益，但该书的核心却仍未受影响。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卡密尔·于连(Camille Julian)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想在《古代城市》一书中寻找的只是古代信仰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在人类组织的结合与人类扩大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也许我们无需改动古朗士书中哪怕是一行字。”^[6]

当年，许多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都曾师从于他，而他思想的影响力除历史学界外，还波及到了法国的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古朗士关于宗教是社会进化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中很有影响，特别是对涂尔干(Durkheim)、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有所启发。涂尔干就读于法国高师时，古朗士正是校长。他深受古朗士的影响。^[7]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对宗教对于社会制度的决定影响作了更广泛的解说。甚至可以说，古朗士对20世纪的欧洲学

[2] 1984年法文新版前言，阿尔多：“古朗士反卢梭”，吴雅凌译，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诠释》第6辑《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3] J.-P. 迈耶：《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艺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页。

[4]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第四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02页。

[5] 1984年法文新版前言，载《经典与诠释》第6辑，第322页。

[6] *Introductory Note of The Ancient Cit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Small, Doubleda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873.

[7] 参见 S. Luckes, *Emile Durkheim*, Londres, Penguin Press, 1973; 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9, No. 3 (Jul, 1977), p. 312, etc.

术思想界都曾产生过相当广泛且持久的影响，如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莫米里亚诺（Momigliano）等人虽对此书有所批评，但仍相当推崇。

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法国各个中学每年指定的课外读物，它似乎已成了法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该书虽“众人皆知，广受赞誉，却再也无人认真去读”^[8]。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欧洲学术界纷纷出版了新版的《古代城市》，但对该书的评价仍是不尽相同。对此，只要看一看新版的法文本前言和英译本的前言就能明了其中的差别。在中国学术界，对于这本书不说是人人皆知，至少也是知者甚众，但凡论及早期国家起源、古代制度及宗教信仰的论著多少都会提及此书，将其作为一家之言。然而，对于古朗士的史学思想，《古代城市》一书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作者心中的问题预设，却无一人一文专门论及。客观地说，在古典学者中，古朗士当今的地位并不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古朗士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提法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甚至被推翻。比如，有关希腊罗马的氏族问题，家内宗教和自然宗教的两种提法及其两者间的过渡，对古代阿提卡地区家庭葬礼的分析，等等。^[9]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一个多世纪以后，作为一个古典学者的古朗士及其著作《古代城市》已如明日黄花，早已过时了呢？在翻译完这部 150 多年前的著作后，掩卷之余，我的脑海中除了古朗士所描绘的那幅古代社会的生动图景外，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行文的风格、他论证的方式、他思想的律动，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当代性关怀。

《古代城市》问世 50 年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这一理论对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做出这一论断的前提判断是，他认为历史

[8] 1984 年法文新版前言，载《经典与诠释》第 6 辑，第 311 页。

[9] 实际上，对于墓地位置变化的兴趣产生于法国革命给社会带来深远而普遍剧变的时代。参见英译本序。

学家研究和撰写历史总是从现实的兴趣出发，为当前的目的服务的。也就是说，“当现实生活的发展需要历史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现在的”。^[10]简言之，当历史学家对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关照从其讨论的对象中显露出来时，他所面对所研究的历史也就具有了当代性。就此而言，古朗士作为一个身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学家，选择一个同样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制度、信仰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这本研究古代社会的著作就打上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鲜明烙印，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而对《古代城市》中古代社会的组织、制度及信仰与他想要应对的当代人的古代想像之间矛盾的处理更张显出作者的思想个性，这种古代与当代之间的紧张与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省和后世学者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思考，也许才正是《古代城市》一书虽不乏瑕疵，但仍不失为经典之作的真正原因所在。

以克罗齐的论断去理解一个早他半个世纪的学者及其著作是否有点牵强附会？但我们始终相信，思想的产生或许可以某个人物的某句话为其标志，却绝不能以某个具体的年月日作为其出现的时间。古往今来，同心同理却不同时间地的例子举不胜举。为了更好地表述我们对于《古代城市》一书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当代性关怀的理解，以下我们将从此书中最引人关注甚或是招致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入手。

二

针对该书的两种最大的批评，一是，这部著作是用先验的概念写成的，而不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着仔细分析的著作。对此，古朗士

[10]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页。

申辩说，“我尤其想要声明，我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写这本书的。……但我并没有很留意地显示这一点，换言之，我想做到简单明了。”^[11]应该说，在1864年之前，作为一个对古典文献非常熟悉的古典学者，古朗士并不是在凭空地“思考”古代社会，他的确是在对原始材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但在《古代城市》一书中，作者并没有罗列史实，而是想要探究这些史实背后所蕴藏的理念。在论及古代信仰与家庭的前两卷中他甚至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年代，古朗士坦陈，“行文到此，我们尚未给出任何年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但他接着又说，“在古代社会史中，用思想和制度的延续来表明时代比用具体的年代为易”（卷三第一章）。我们想补充的是，这样做不仅更容易一些，而且也更客观、更妥当一些。芬利（M. I. Finley）虽然认为，古朗士在《古代城市》一书中缺乏对史料的分析，多是一些“论战式的空论”，^[12]但他同时也承认：“在缺乏统计数据的古代，猜测是可以被允许的。”^[13]

批评的第二点是有关学术规范问题，该书所涉及的领域在当时并非完全无人问津。但书中没有援引任何一位当时的学者，也没有直接论及任何一部当时的论著，就好像真正的对话仅仅存在于古人与作者之间。实际上，当时德国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些著作也已译成了法文。如尼布尔的《罗马史》（Niebuhr, *Histoire romaine*）和蒙森的《罗马史》（TH. Mommsen, *Histoire romaine*）。但在《古代城市》一书中，菲斯泰尔·古朗士故意不理会这些近代的学术权威们，对此，我们在其死后的遗稿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宁可错误地按照李维的方式而不是尼布尔的方式。”（英译本序）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古朗士对德国学术强烈的不信任感。除了这种带有情绪化的表述外，在他的《方法

[11] 1984年法文新版前言，载《经典与诠释》第6辑，第311页。对此，比较温和的批评则是“他喜欢钻研困难问题，但他把这些问题表述得过于简单了；他只看到问题的困难，并没看到它们的复杂性”。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第四分册，第508—509页。

[12] 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9, No. 3 (Jul, 1977), p. 312.

[13] 同上, p. 305.

论》一书中，古朗士指出，历史学家应该直接阅读原文。别的学者的研究可能是有用处的，但很容易引导研究者走入歧途。历史科学是对文献的解释，为此，只要有无偏见的头脑和精通原文的本领就够了。^[14]他在《古代城市》一书中涉及古代编年史时说，“这些书中所记载的即使不全是真的，但至少也是祭司信以为真的。而如今，历史学家们想要找寻古代的真相，这些书便是很重要的资料来源，如果说他们不得不面对那些错误，但至少他们不必面对虚假的史料。甚至这些错误仍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是与史家所研究的古代同时代的，如果说这些事件的描写不是很详细，但至少是当时人们所坚信的”（卷三第八章）。

有关自由的问题是该书引起关注的第三个关键所在。古朗士认为，在古代，由于国家至上，国家对人民有绝对的控制权，因而是没有任何个人自由可言的。他说，“人毫无自主之处，他的身体是属于国家的，有保卫国家的义务”，“私人生活也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希腊教育也不是自由式的。相反，国家对之控制甚严”，“国家认为，每个公民的身体与头脑都是属于它的。因此希望以某种方式来塑造其身体与头脑，使之能够对国家最有益”，“个人没有选择信仰的自由”，等等（参见卷三第十七章）。“以为古代城市中的人们是自由的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的”（卷三第十七章）。而“如今，这种错误并非是没有危险的。近人对古代希腊罗马的误解时常妨碍他们。误察古代城市制度，往往使人们幻想要在当世复兴古代制度。他们误解了古人的自由，只此就足以将近世之自由陷入危机之中。最近八十年的事实已清楚表明，阻碍现代社会前进的一大障碍便是在近人眼中总习惯性地存有古代之希腊罗马”（导言）。

宗教是书中的第四个敏感点。古朗士发现，在古代，宗教最有力

[14]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6页。

量。他书中对宗教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古代城市》出版之时也正赶上欧洲人对宗教史产生强烈兴趣的高潮时期(这股对宗教史产生的兴趣于19世纪三四年从德国传到法国)。他在书中把宗教的作用写得极其突出，他写到：“如果说人类要接受上帝是惟一真神、是无可比拟的、无限的观念尚需若干世纪的话，人类无论如何是在逐渐扩大其思想、慢慢脱离这俗世的事物，从而渐渐接近于那个理想。”(卷三第一章)由此，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有人指责他写了“为基督社会反对古代的辩护辞”。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解都无济于事。

三

对于以上所提及的四点，我们只有将其放在古朗士所处的时代及其他对此所做出的回应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古朗士出生时恰逢法国七月革命巷战正酣之际，他受教于查理曼高级中学，20岁进师范学院。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对法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研究来说是一个压抑的时期，“莫议国事”是学者们避免惹祸上身的处世原则。古朗士似乎也与别人一样，研究起古典时代来了。但他的老师和同行们很快就发现，他并非是响应号召，也不温顺，他们甚至被他的某些创见惊呆了。1853年，他接受新成立的雅典法国学校的聘请，在希腊逗留了两年的时间。离开时撰写了一篇有关开俄斯岛的论文(1857年)。1858年，古朗士以两篇有关希腊的论文获得其博士学位。文章的中心思想、对原始文献的分析，以及有力的讲解——所有这一切都已显露出《古代城市》的先兆。他从1860年起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代城市》出版的当年，在基佐(Guizot)的推荐下，他入选并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蒙提翁奖(Montyon)，维莱梅因(Villemain)在颁奖仪式上是这样介绍他的，“学者、政论家，他开拓了古代

研究的新视野，并具有出色的写作才能。”^[15]这样的评价对于我们了解古朗士的写作态度及其想要表达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正如许多评论所言，《古代城市》关注起源问题，亦是在探讨从历史到当前的自由问题。写作计划非常明确，我们甚至可以在这本书上加个副标题：‘为了结束对古人的模仿’。古朗士在此针对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及大革命对于古代的仿效。”^[16]在 1864 年之前，作为古典学者，古朗士察觉到某些近代作家将罗马执政官描写成了近代国王或革命领袖，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作者是个保皇党时罗马执政官就成了近代的国王；而如果作者是个共和党，那就把罗马执政官写成革命领袖了。而古朗士认为，“古代的希腊罗马对于我们呈现出一种绝对的不可模仿性。近世之中无一事与之相似，将来也无法与之相似。”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使我们在童年时代便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很熟悉了，且习惯于不断地将他们与我们自身相比较，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来判断他们的历史，以他们的经验来解释我们的革命。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使我们认为自己与他们很相似。若要将他们视作外族则很困难，我们几乎总是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因此产生了许多错误”（导言）。所以，他“力图在本书中清楚地说明，这些古代民族与现代社会主要的本质性的区别何在。……力图说明，管理这些古代社会的是怎样的一些条例，这样便能容易地明白，这些同样的条例再也不能用来管理人类社会了”（导言）。也就是说，对于古朗士而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梳理这个古代世界建立的原则，展示它得以协调的正确逻辑，重现它的建构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它所经历的诸次革命、它的循序渐进的解体，以此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为人类进程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古老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导言）。

[15] 1984 年法文本前言，载《经典与诠释》第 6 辑，第 310 页。

[16] 同上，第 317 页。

可见，古朗士选择在这一时期研究古典学并非是出于逃避政治，明哲保身，正好相反，这一选题充满了现实性。

他之所以没有铺陈大量的史料，单纯地叙述史实，不是因为他不够勤奋，也不是他不熟悉古典文献，他曾夸口说，“自己是惟一的研究过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一切拉丁文材料的人。”^[17]之所以对史料的罗列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是因为他力图解释的是原因、性质和意义。他说：“历史并非只研究事件和制度，它真正的研究对象应是人类的心灵：历史应该是要了解不同时期人类头脑中的所思所想、所信所感。”（卷二第九章）我们应该感谢古朗士，他最终并没有将此书写成一本《古代希腊罗马史》，^[18]若是那样的话，学科的发展更新势必早已将它扫入了无人光顾的故纸堆里，而我们也就少了一本今天仍然能够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并引发许多思考的经典之作。克罗齐说，“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19]克罗齐还说，对于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我们甚至可以原谅他把人名张冠李戴，把河流误当作山脉或者是混淆了年月时间，只要他在整体上将雅各宾派的灵魂、巴黎民众的精神状况以及布贡迪和拉文迪农民的心态比别人重新复活得更好。^[20]对于古朗士的《古代城市》一书，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他之所以不顾学术规范，故意忽视德国学者已取得的成就，是与其一贯的政治立场相关的。虽然他“没有真正参加到所谓政治实践中去，但是对于政治问题他并不是没有具体的看法”。^[21]事实上，“古朗

[17]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第四分册，第510页。

[18] 事实上，从第二版起，古朗士明显增加了参考内容的分量，注释方面也作了进一步的增补，但仅此而已。他并未重写《古代城市》，因为他认为这样等于是完全破坏了全书。

[19]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08页。

[20] B. Croce, *Logic*, London, Macmillan, 1917, p. 282.

[21] Edward Jenks, “Fustel de Coulanges as an Histori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 No. 46 (April 1897), p. 212.